

4703/13

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十辑

(总第120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编
· 中国文史出版社

责任编辑：方正

文史资料选辑

第20辑

(总120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编

*

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北京太平桥大街23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通县燕山印刷厂印刷

劲松装订厂装订

*

1990年4月第一版·1990年4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7 字数：178千字

印数：1—11000册

ISBN7—5034—0110—9/K·079

定价：2.95元

目 录

· 耆年自述 ·

往事的回顾.....刘尊棋(1)

“五·四”时的小学生——青年会中专——
美籍英文老师——韩柳文章易上口——初
受政治冲击——“三·一八”惨案——家
庭教师 and 就业——自由和广泛地读书——
开始投稿——走向革命文艺——参加塔斯
社——第一次采访——不介入中国政治
——北平“左联”成立——结婚和入党
——蜀子被捕和潘问友——我第一次被捕
——过堂和带脚镣——写信给宋庆龄——
在监狱中学习马列——我的释放和敌人的
诡计——找不到党和重返塔斯社——筹备
《世界论坛》——第一次做上层说客——到
武昌访张学良——离开塔斯社，加入《展
报》——当编辑受锻炼——“开天窗”抗
议——《展报》被封和集体辞职

· 艺术生涯 ·

回到童年.....邵 宇(35)

敲开文学殿堂的大门……………李 准(45)

· 民国人物 ·

我所知道的曹汝霖……………李静庭(64)

· 晚清人物 ·

李鸿章事迹数则……………李家琛(75)

回忆先父陕甘总督长庚在西北的四十余年……………赵欣余(83)

先父长庚奉旨二次出关的前前后后……………赵欣余(96)

清末陕甘总督长庚事略……………武向晨(101)

我所知道的铁良……………李炳之(109)

· 王公贵族 ·

记祖父端郡王载漪庚子被罪后的二十余年……………毓 运(118)

记祖父端郡王载漪庚子被罪后的二十余年(续编)……………毓 运(147)

恭王府和恭王府典卖房产、土地之经过……………毓君固(172)

辨正《史话》及补充史料……………恽宝惠(180)

· 宗教史料 ·

解放前后的广化寺……………祥慧 志山(185)

白云观史略……………于华文(191)

拈花寺的生活见闻……………圣 泉(199)

通教寺……………密然 又然 正义(209)

往事的回顾

刘 尊 棋

作者刘尊棋，全国政协常委，曾任《中国日报》主编。他自小求学刻苦，成绩优秀；亲身经历了“三·一八”惨案，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革命文艺道路后，参加了塔斯社和“左联”的工作；经受了“草岚子反省院”的考验和长时期的误解……作者在文中对自己抗战全面爆发前的往事，做了详尽的回顾。

“五·四”时的小学生

我没有学习过新闻学，平生没有听过一堂新闻学课。以新闻工作为职业，不是我自己的选择。但至今我吃的还是新闻记者的饭，很可能要吃到我不能吃饭时为止。为什么它成为我的终身职业？是谁要我这样做的？是什么力量导致我这样？回答是：一种要求认识和改变周围社会的愿望和生活中许多偶然的机遇造成的。

我出生在一个私家厨役的人家，母亲原来在一个纺纱厂做工，生我后不久，就在父亲的东家做奶妈。我5岁时，父母跟他们的主人从上海到北京。不久父亲把我交给一个私塾，念过一段时间书之后，就送我入普通国民小学，就是王府井大街阮府胡同原“第二十五小学”，我在这里上完初小。记得在四年级毕业前一年，学校庆祝“欧战”胜利，操场有大幅标语，写着“公理战胜

强权”几个大字。不久又在课外有很多活动，一种活动是兜售《学生周刊》，每个同学从教师手里领到一二十份小型铅印的报纸，个人到处叫卖，卖的钱和卖不完的报就还给老师。好像我们自己每人还须花大约两个铜元买一张。文官的母亲带着浓厚的南方口音，给我钱时总问不出来我买的是什么东西。我说《周刊》，她听不明白，就问：“怎么？又要买‘猪肝’啦？”再一种活动就是兜售国货。每个学生从老师手里取来一个带白绳子的木托盘，内有几块洗衣肥皂和几条毛巾，托盘前面的横档上写了几个毛笔字：“提倡国货，抵制日货”。我们把那条绳子套在后颈上，托着一木盘的毛巾肥皂，向邻居和街上的人兜售，同时还向他们宣传一番。有几天特别热闹，成群结队的大学生，举着红布旗子，闯进布店和百货店，抱出整捆的东洋“阴丹士林”和花布堆在街心，点火烧掉这些“日本货”。这些大概就是我在“五·四”运动中的一些表现。

进入高小，我换到什锦花园小学（好像叫做第十一小学）。这时高小一般都是三年毕业，但这个小学吸收新事物极快。第一年就宣布实行“道尔顿制”——一种美国刚刚实行的新制度，就是把三年的功课压缩到两年，语文、算术、地理、历史四门都不上课，而由老师分门别类，开出题目，一排一排贴在课堂墙壁上，老师隔几天向全体学生讲一次大课，然后学生就自己读书，对照老师开出的题目做出答案。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这一班两年后就和上一班学生同时毕业了。

教我们这班的老师大部分是保定师范出身的。特别是语文和历史老师，不仅给了我们很多知识，而且把我们浸泡在爱国主义的浆水中。我记得每一次讲近代史时，讲到鸦片战争、英法联军进攻北京、义和团和八国联军，以及甲午战争、马关条约等等，我们全班同学首先是三三两两地哭出声来，接着是一齐痛哭失声，最后老师也泣不成声。

青年会中专

从小毕业后，同学面临升什么中学的严峻问题。我的父亲在失业中，情绪特别恶劣，常常打骂母亲。在这种情况下，谁也不管我的升学问题。我投考了北京师范学校，因为知道它不收学费，四年毕业后就分配到小学去当教员。但是报名的很多，录取的不过40人。我记得入学考试的国文题目是把一段古文译成白话，这段古文是《曲突徙薪》——《汉书》上的一段寓言故事。我一点都不懂，交了白卷。这种事给了我极深的教训。后来一有机会便发狠读古文，就是这次给我刺激的结果。

两个小学的同学告诉我，他们找到一个不收学费的中学，新办起的“怀幼中学”，要我去试试。这是一个山西省省籍的国会议员捐资兴办的私立中学，实际主持的是一位姓李的教育长。我一报名写上籍贯是“湖北鄂城县”，他就用湖北话和我攀谈起来，虽然也考试了几个题目，不等发榜，他就告诉我到时候来上课就是了。

这个学校既没有历史地位，也没有任何特色，它对我的成长却起了一个重要作用。它的一个国文教员冯耀西先生，又是一位保定师范出身的40来岁的老师，对我特别同情，极力培养。这个学校本来不收学杂费，但冯老师知道我的家境困难，继续读下去还是不大可能的。到三年级时，他就劝告我转学到青年会财政商业专门学校去。他在那个学校兼语文教员，说有一种奖学金制度，凡季度考试成绩列前三名的都可免费，而且经常有课余劳动，每月可得几元钱工资。最重要的是，学校各门功课除国文外，其他全用英文教学，还有外国老师，四年毕业后保证有职业。我可以报考插班生，第一个学期困难大些，因为学费特别高，以后凭我努力学习，只要成绩好，就有机会获得奖学金。

多半由于冯老师的关心，我考入了财政商业学校二年级上学期。开始一个学期，学费和书籍费约35块钱，冯老师借给我20

元，我家的房东慷慨借给10元，母亲又当卖了些衣服，凑够了学费和书籍费。这个学校不但有季考，而且月月考试都张榜。我第一个学期月考就名列前茅，季考名列第一，所以从升入三年级上学期开始，我就再也不缴学费了；不但如此，我还被录为图书馆助理员。每天下午放学后在本校图书馆帮助同学还书、借书，每月学校为此发给我6元助学金，这就不仅解决了下一学期买书的钱，我还贴补了家用。

美籍英文老师

财政商业学校的这个奖学金制度，在我的青少年精神中注入了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不管困难多么大，靠我自己的努力，没有不可克服的了。

这是20年代美国教会在北京专门培训洋行买办以及银行职员的一个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每半年毕业一班学生，不过三五十人，都被吸收到各洋务机关。在军阀混战、百业凋零的北京，中小知识分子职业毫无保障的年月里，这个学校出身的青年，饭碗是比较靠得住的。学校对于中国语文、英文（分读本、文法、会话）、英文打字、簿记、合计、珠算等基础课特别重视。我读三年级时，英文课有两个美国教师，一个姓阿兰，一个姓贝克尔，都非常认真。尤其是阿兰，给我的印象极深。他并不满足于教授课本知识。记得一年快暑假时，他要我在即将到来的暑期中，天天去一趟他的住处（东单北协和医院教职员宿舍），是他，把我引导上一条和“财商专校”完全不同的道路。他一开始就给我看一本厚厚的袖珍式《牛津诗选》，他要我先不要回答“喜欢不喜欢诗”的问题，只是说：“你努力学会一首诗吧。”他翻给我看的是葛雷(Thomas Gray)的《墓院哀歌》(“Elegy Writen a Churchyard”)说：“这是一个一生只写了一首诗而进入诗人王国的文豪。”对我这个只学过两年英文而又毫无一点文学基础的人，介绍这么一

首古典长诗，后来我多少次回忆都猜不出阿兰先生的动机。但是觉得老师为此赞赏这首诗，必定有一定道理，我也就硬着头皮，翻字典，10天左右，好容易弄懂了诗句意思。在这个期间，阿兰先生为我朗读了两次，看我多少领会了这诗的内容，他又介绍了两首英国浪漫派诗人华兹沃兹的两首小诗。尝到这点诗的味道之后，我就在拼命学好课业之余，到处借文学书籍。刚刚在这时，读到郭沫若的《女神》、《凤凰涅槃》，蒋光慈的诗，英文的英国文学史，郑振铎的《世界文学史大纲》，总之，抓到文学著作就读。

韩柳文章易上口

我在财政商业学校毕业（1928年）以前，一个夏天，邻居是一位在民国大学教课的江西老先生，他看我常常到傍晚还坐在院子里抱着一本厚书读，就问我读的是什么书。我说是一本英文诗选，他摇摇头，似乎觉得不可理解，接着又问：“你喜欢《诗经》吗？”我说：“看不懂。”“《离骚》呢？”我说：“都太古，读不懂。”他于是从书架取下一部《古文观止》说：“你现在还是先读些古代散文吧。”我说：“好”，要求他选几篇试试看。他翻开书，选了贾谊的《过秦论》、诸葛亮的《前出师表》、韩愈的《原道》，后来又加上《滕王阁序》和《岳阳楼记》。这几篇古文我一开始就爱上了。他问我时，我表示乍看起来，有困难，硬着头皮读下去，越读越喜欢读了。老先生启发我说，韩柳的文章容易上口，因为他们把道理说得透彻，“理直才气壮”。他告诉我：“你如果背诵100篇，下笔写文章就会很不同了。”这一个暑假我没有背诵100篇，但熟读了至少50篇。秋季开学后，我的国文卷子果然大受冯老师的夸奖。有一段时间冯老师生病，给他代课的一位年轻女老师姓周，常出作文题，对我每一篇文章都看得很细，在好的句子边上用红笔连串画着圈圈，有时还批着赞美的话。

这个时期我的兴趣远远超过语文读物的范围。一个留校教会

计学的年轻的谢老师借给我一本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讲演录》，这时北伐军还没有打到北京，“三民主义”还是不能公开买得到的。此外，我还从图书馆借来梁启超的《饮冰室全集》。梁的文章不是白话，但他的文言文和白话差不多，很容易看懂，我对于他写的关于英国议会（“巴力门”）的记载，特别有兴趣。我后来看到不少用白话文写的外国游记，感觉没有一篇在文采上写的像梁启超那么动人。

初受政治冲击

这一年我以极大兴趣看完《红楼梦》，紧接着又从图书馆借来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那时不用说，我对于《红楼梦》一点认识也没有，但是看蔡元培的《索隐》，越看越糊涂，不管怎么样，那种把宝玉和金陵十二钗都说成影射清朝顺治皇帝家属中每一个人的说法，我也觉得完全不可相信。另一方面，对胡适的考据，倒觉得他写的头头是道。

从1925年到1928年这三年间，在大环境方面，北京的学生受到很多政治的冲击。我所在的青年会财政商业专门学校，由于是个教会学校，并且以培养洋行买办为任务，学生埋头读书的多，参加政治活动的很少。但是，作为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一个成员，全市性的示威游行，我们学校还是全体参加的。名义是全体，事实上还是一部分。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有几次：

1925年“五卅”运动，上海日本纱厂工人顾正红等被杀害的消息传到北京，北京也卷入全国的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和商店罢市的活动。我们学校也罢了几天课，学生被动员参加了6月3日天安门广场的大会。我站在离主席台很近的地方，看见主席台上人们一个一个拿起喇叭筒力竭声嘶的演说，情绪是很激动的。当一个长头发的青年当场用刀子戳破自己手指，又用自己的血书写了几个大字时，全场沸腾，情绪达到极点。我跟着喊口号，喉咙都

喊嘶哑了。不久，天空北边阴云密布，风向南刮，一会儿下起大雨来，会场开始散开，大队一齐向南边的正阳门前进了。前头到正阳门后，停止前进，向东折了一会儿又都向北走了。这时雨下得更大了，真是瓢泼大雨。游行的队伍虽然很不整齐，但人人都顶着大雨前进，一边还呼着口号。这一次游行的队伍陆续集中到东单北边的外交部大楼前面。在群众的高声呼喊中，当时的外交总长走到阳台上，比较客气地讲了几句话，大家才陆续散开。这时参加游行的妇女还不多，但在我行进的前头不远有几位妇女，也和大家一样，混身被雨淋湿。记得最前头的一个，梳着辫子的，人们指着说，她是刘清扬。抗日战争中，我多次在重庆看见过她，那时她已和张申府分居。

大约在1926年夏天，北京的学生已经知道北伐军打过了武汉，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中央政府实行革命外交，外交部长陈友仁宣布收回汉口和九江的英国租界，北京的学生们非常兴奋。^①当时在北京出现了陈友仁主编的英文日报，名字是《中国时报》，我们学校一向是重视英文的，这个报每天送给我们学校100份左右，分给同学到街头卖。这时北京刚刚通了有轨电车，我记得卖《中国时报》，可以不买车票，我就常常换乘电车，卖的报，比别人都多。后来，想到中山公园露天茶座去，那里茶客“上等人”多，不少是西装革履的。不料那些看起来洋派的人，却很少肯买报，有时候不但不买，还讥讽两句。我们说卖报的钱都是捐给上海罢工工人的，他们还表示不相信的样子。过了几天，不知是不是《时报》停刊了，报纸就不卖了。

^① 《民国大事日志》载1927年1月7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在汉口召各领事及外侨，宣布接管英租界情形，并声明保护外人安全。另，《民国大事日志》载1927年1月15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令赵畸组织“九江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成立后实行管理租界，恢复交通秩序。——责编

“三·一八”惨案

1926年“三·一八”惨案，我记得比较清楚。这天上午我已被通知到东城翠花胡同学生联合会去开会。我们学校有一个高年级的学生“老陈”，是学联领导人之一。他给了我一大把传单，并要我和几个同来的同学一齐准备游行到铁狮子胡同段祺瑞的“执政府”前示威。这次动员工作做得很充分，我从传单上看到日本兵舰和军队怎样攻击塘沽一带，迫令中国撤除天津防务，还给中国政府一份“哀的美敦书”，也熟记了传单上的各种口号。下午我们全校都在礼堂开会。“老陈”作了煽动性很强的演说。有些同学小声说，老陈是个“共产党”，我虽然完全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但觉得他这么能干，勇敢，打心里佩服他。

我们这批学生从礼堂（灯市口南的米市大街）出发到铁狮子胡同（现改称“张自忠路”），实在不很远，但不知为什么，到达铁狮子胡同却比别的学校都晚，到胡同口外一看，里面已挤满了人，段祺瑞的执政府（原来的旧陆军部）大铁门外站满一排荷枪实弹的军队，门外广场一直到大门对面的“影壁”前，都站满手举大小旗帜的学生。我们进不去，就都站在胡同口外边，我自己登到墙外一个土坡上，扶着墙顶，可以看见广场的景象。

我们跟着汹涌的示威群众喊了一阵口号后，突然听到联珠炮似的枪声，同时广场上挤得满满的群众忽地都向胡同口外的我们这边街上跑开了；枪弹好像射中了电车线，有一根电车线掉到马路上，人们更吓得跑开。我在枪响后，也不再探头看广场，而走到土坡下，靠大墙站立了一会儿。只听见枪声停了，呼喊声、叫骂声和哭声不停地从广场涌过来。我看看一块儿来的三四百个同学都四散了，但也有人，像是别的学校的同学在喊叫：“把受伤的抬到医院去！”

两天以后，我从报纸上看到当天在段执政府广场上被残杀的学生多至47人，而在最前头的女师大学生中就有刘和珍、张静淑等人。尽管我参加了铁狮子胡同的示威游行，和目睹了“三·一八”惨案的现场，几天里也以我们学校的学生代表资格到协和医院和女师大慰问死难和受伤的同学，但是自己对这个伟大事件的政治意义却非常模糊。只不过看见那些活生生的英雄人物随着枪声倒下去，对于她们那种视死如归的形象，久久不能忘却。随着时光的流逝，她们的高大形象在我的脑海里越来越鲜明。直到5年以后，我通过在“三·一八”那天外衣袖被枪弹穿透，但幸免于难的郑文波（蜀子）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参加“左联”工作之后，才在政治上意识到这一事件的历史意义。

家庭教师和就业

“三·一八”事件以后，北京学生的政治活动明显地减少了。我们学校的领导者“老陈”突然“失踪”了。有人说他是共产党，跑到南方去了。究竟如何，我完全不知道。这时期因为父亲失业，家庭生活十分困难。我因在校学习成绩好，学费免缴之外，经同学介绍，暑假里到一个商人作教师，给一个考中学有困难的孩子补习功课，每月还多收6元，全部贴给家用。

1928年1月春节是我从财政商业学校四年期满毕业的时候。在最后一两年，每月考试一次，发榜时学生的分数都发表在榜上。我的名字常在榜上头几名中，毕业考试更是名列第一。“财商”过去每届毕业生的头几名多被人预定，有的留校为教员，有的经学校推荐，一般说，工作是有保证的。我被通知到燕京大学担任政治学系的秘书，每月工资40元。这个待遇当时对我确实是求之不得的，但我还提出一个要求：作旁听生，宁可工资少一些。事实上，我开始报到后，政治学系主任徐淑希教授同我谈了几句话后就痛快地表示，欢迎我作旁听生，只要做完规定的事

情，随时可以旁听，并且考虑给我“学分”，但工资是学校确定的，不得减少。

徐教授同时兼燕京大学研究生院委员会主任，但他的办公室除他自己外，另一间房子给我用。系里只有两位助教，极少人来办公。这位中年博士是广东潮州人，说普通话很困难，日常只说英语。他同他的漂亮夫人也是用英语交谈，上课当然用英语。但是他显然觉得讲不好普通话是一大缺点，所以专门请了一个北京人（给外国人教汉语的老师），每天早晨上课1小时。很奇怪，他学习的课本却是《论语》，后来我才了解，他是借学北京普通话的机会，学点古汉语，实行“一石二鸟”。

我的秘书工作是再轻松不过了：每个学期经常要用英文打出全系教职员姓名、职务、薪金，每星期的课程表，临时的变动等。比较多的是徐教授个人的英名信件，以及他的著作。他这时比较看重的是“满洲问题”，他用英文写的这本书，我一页页打出来，我打得又快，又准确，一般很少改动，徐教授对于日本在东北的经济、交通（铁路）、军事的侵略阴谋十分重视。对于炸死张作霖事件，作为日本企图霸占整个东北的阴谋公开暴露，他极力揭发。并且积极地参与美国的太平洋关系学会，参加反对日本侵华问题的讨论。1947年我在纽约访问坐落在成功湖的联合国时，徐先生还是中国代表团的顾问。

这时（1928年），北京因北伐军事已将张作霖的东北军赶出关外，政治上隶属于南京的国民政府之下，五色国旗改换了青天白日旗，北京改名为北平。燕京大学按照教育部注册的要求，原来的校长司徒雷登，退居教务长，校长换上一个中国的老学究吴雷川，学校照章应增加“党义”课，自然属于政治学系的事。徐淑希延聘了一位老同盟会会员、他的同乡潮州人，教这门课。这位先生没有课本，也写不出什么讲义，真是活受罪。

自由和广泛地读书

但是在燕图的两年里，却是我读书最多、最自由的时期。燕京有一个很好的图书馆。馆长是中国设有图书馆学最早的武汉文华书院的老毕业生，姓田。这个图书馆就像一个由我任意游泳的大湖一样。由于我的特殊身分，什么时候去都行，又可以毫无拘束地到书库翻阅任何书。要借出几本书，也没有限制。因为对《古文观止》已经读出兴味了，我就拼命钻古文，先看史书，从《纲鉴易知录》读起，又读《资治通鉴》、《史记》，后来找到清史，非常有兴味地读完萧一山的一卷本《清代通史》（近代台北出版的四卷本，觉得大不如前）。文艺书也硬着头皮扳些古书，什么《诗经》、《楚辞》，以及《封神演义》、《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抓到什么看什么。后来偶然看看古人写的笔记和评论的文字，渐渐感到书读得多，读得滥，后悔过去浪费掉很多精力，得不偿失，又不愿意“重头来”，或重复看过的书。

开始投稿

这个时期进步、革命的文艺纷纷出现，燕大图书馆也注意收购。北京当地的《语丝》、《晨报》、《京报》创刊，和上海创造社、太阳社出的新书和刊物，我们都可以看到。特别吸引我的是苏联小说的英译本。对我印象最深的是高尔基的《母亲》和他的短篇小说集。高尔基的作品第一次使我相信文艺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武器。我开始有了发表文艺作品和翻译的欲望。第一次是翻译高尔基的《四十一个人和一个人》的短篇小说，写一个少女在一家面包工厂当工人的故事，投给《新晨报》副刊，不仅很快登了出来，还收到主编孙荪荃女士的一封信。不久，我作家庭教师时教的一个李家的孩子死了，我写了一篇《华生之死》。特别是将

布哈林著的《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关于文学艺术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一段文字译出，孙荪荃也给登出。这篇文章大约有1万字，连登了三天，引起了不少人的兴趣。

走向革命文艺

这个时期，由于有一次偶然地读了陀思妥也夫斯基的《罪与罚》，我对这个旧俄时代的作家，有了极大兴趣。刚好在法文书店买到一本英文翻译他的《死人之屋》，描写他被流放在西伯利亚监狱中的生活。一种冲动驱使我着手将它翻成中文，但是我问过几个人都找不到愿意出版这么沉闷的长篇小说的书店。最后，《世界日报》印刷厂的厂长表示他办了一个“平民书屋”，愿意出版它，但他只愿给我40元稿费，说什么他不愿再多出一块钱。结果我只好把稿子给他，好处是没等书印出来，他就将40元给了我。这是我第一次收到这么多稿费。我为母亲买了一件皮袄。

我有一个同学的朋友叫李善丰，在北京大学经济系读书，看到这篇文章就找我谈了好久。他当时是个埋头读书的人，对社会现状不满，可是十分胆小怕事，却对文艺很有兴趣。他介绍给我几个北大学生，说他们想组织一个文学团体，希望我参加。不久，通过他，我就认识了他的同学娄海山（后叫凝先）、王冶秋和爱巫修等人，我每星期日由海淀进城到他们多数人住的北大宿舍“东斋”。不久，大约1930年3月间，我们就组织了一个文学团体，叫做“展望社”，除上述诸人外，还有女师大的谢冰莹（《女兵日记》作者）、穆雨君（已故）和清华大学的学生冯仲云等。

这时我还结识了一个年龄较我大得多的燕大社会学系学生李安宅。他早年大概参加过革命，但这时是一个无党派，但思想相当激进（解放后大约1952年他写信给当时北京中共市委秘书长李绪纲，希望“恢复党籍”。）就是他，介绍我看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他对于中国封建文化，西方资产阶级教育，以及当时的国

民党，都有强烈的批判见解。他当时正同一位刚从日本回国的女知识分子于式玉谈恋爱，准备结婚，为了生活，正在翻译匈牙利裔的英籍历史学者斯坦因著的《中亚史地》。李安宅在1930年5月把我介绍给苏联塔斯通讯社北平分社的负责人斯列巴克。塔斯社当时在中国已有合法地位，每天从莫斯科总社收到英文新闻电报稿，需译成中文油印分发给中国报纸，同时主要将中国报纸上的新闻报道用英文发到莫斯科。这个北平分社只有斯列巴克一个人，他又不懂中文，通过关系他找李，李自己不愿去，就问我愿不愿去。

参加塔斯社

他原来介绍的一个名叫多林的苏联人同我谈了一会儿，就转介绍我见斯列巴克。斯要我做两个测验，一个将一篇英文电报新闻稿翻译成中文，然后再将当天的天津《大公报》社论在他的英文打字机上译为英文。确切地说这样的中英文新闻，我还没有做过，并不熟悉。但是由于我的中文和英文阅读能力已有相当根底，而且由于十分倾向苏联和无产阶级文艺，又会英文打字，所以我比较从容地交出这两篇译稿。当天下午，斯列巴克和多林一块儿看了，很快就跟我说，他们对我的翻译很满意，相信我实际工作一段时间后，文字会更流利。他们说，决定我每月工资100元，希望我最近就开始工作。我说，我辞掉燕京大学的工作后就可以来了。

我向徐淑希教授辞职却超出意外的困难。他非常直率地反对我给苏联工作。“那是一个危险的地方，将来你会后悔的！”他说。他表示对我本来寄予很大希望，而我太使他失望了。我虽然极力表示对不住他，但这时要我放弃去塔斯社工作的机会，怎么可能呢？

在那以后不到10天，即1930年5月中旬，我开始在塔斯社工